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丁德科 梁建邦 党大恩 主编

2010年卷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年鉴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省古代文学重点扶植学科”资助项目

渭南师范学院“秦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0 年卷

主编 丁德科 梁建邦 党大恩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0年卷/丁德科,
梁建邦, 党大恩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945-4

I. ①司… II. ①丁…②梁…③党… III. ①司马迁
(前 145 ~ 前 90) —人物研究②史记—研究—2009—年鉴
IV. ①K825. 81②K204. 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687 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0 年卷(总第七辑)

主 编 丁德科 梁建邦 党大恩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渭南澄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6 开 9.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945 - 4
定 价 22.00 元



2010年“中国商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梁建邦 摄）



2010年“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式（梁建邦 摄）



2010年“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与会代表考察肇庆七星岩（梁建邦 摄）

2010年“中国商洛司马迁与
《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
考察武关遗址（梁建邦 摄）



本刊主编、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副会长梁建邦教授在2010年“中国商
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致闭幕词（杨冬菊 摄）



陕西省韩城市徐村司马迁墓
（梁建邦 摄）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0年卷)编委会

顾问: 韩兆琦 张大可

主任: 丁德科

副主任: 梁建邦 党大恩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德科 马雅琴 王晓红 韦爱萍 杜振虎 张 晶

赵怀忠 党大恩 党艺峰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詹歆睿 蔡静波

主 编: 丁德科 梁建邦 党大恩

7201280

目 录

学术前沿

垓下之战遗址地望考	袁传璋 (1)
-----------------	-----------

研究综述

2010 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党艺峰 党大恩 (7)
司马迁生平叙述及其学术史反思	(7)
司马迁天道观念研究	(8)
司马迁史学观念研究	(10)
司马迁价值观和生死观研究	(12)
司马迁诗学观念研究	(13)
司马迁文学和美学观念研究	(14)
司马迁政治观念与士人观研究	(15)
司马迁战争观研究	(16)
司马迁与地方文化研究	(17)
2010 年《史记》研究综述	梁建邦 (18)
思想内容研究	(18)
人物研究	(20)
体裁体例研究	(25)
版本及校勘研究	(26)
考证考古研究与文字考证辨析	(28)
写作艺术研究	(28)
比较研究	(30)
语法文字研究	(30)
史记学研究	(31)
近十年来孙子与《孙子兵法》研究综述	郭天祥 (37)
1972 年以来孙臆与《孙臆兵法》研究综述	郭天祥 郭翠婷 (43)
李广研究综述	梁建邦 (49)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0 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杜振虎 (56)
齐文化、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	(56)
商周考古新发现	(56)
东周考古新发现	(57)
秦汉考古新发现	(58)
2010 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杜振虎 (61)
三皇五帝时代考古研究	(61)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62)
二里头遗址与夏代文化考古研究	(63)
商文化考古研究	(64)
西周考古研究	(66)
春秋战国考古研究	(69)
秦汉考古研究	(71)

版本整理与研究

版本与校勘研究	王晓红 (76)
版本研究	(76)
校勘研究	(78)
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韦爱萍 (83)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	赵怀忠 (91)
重要论文摘要	马雅琴 (97)

港台及海外研究

《史记》在国外被翻译	凌朝栋 (110)
------------------	-----------

研究动态与“史圣”文化

“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综述	(113)
2010 年中国商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14)
项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隆重召开	(117)
第六届民祭“史圣”司马迁大典在司马迁祠墓举行	(117)

学术组织与专家

徐日辉教授	梁建邦 (118)
-------------	-----------

论文著作索引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 (2010)	詹歆睿 (120)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 (2010)	詹歆睿 (122)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 (2010)	赵怀忠 (131)

史海拾贝

《史记索隐》简介	张 晶 (136)
----------------	-----------

后 记	(140)
-----------	-------

垓下之战遗址地望考

袁传璋

汉王五年（前 202）12 月，相持将近五年的楚汉相争进行最后的决战。战役结局是西楚霸王项羽（前 232—前 202）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而汉王刘邦（前 256—前 195）则在同盟诸侯及部属将相拥戴下荣登皇帝宝座，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这场决战的战场是垓下还是陈下？垓下的真正方位又在何方？近来颇有争议。^① 本文拟对以上议题做点粗略的梳理。

一、楚汉最后决战在垓下展开毋庸置疑

汉王四年九月（前 203），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在荥阳广武山缔结鸿沟和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②。这项和约符合当时军民渴望弭息战祸、休养生息的大愿，所以汉、楚两军“皆呼万岁”。项王履约即时遣返前年彭城大战时俘获留作人质的“汉王父母妻子”，解除与汉方的战争状态，从广武前线“引兵解而东归”。由于楚都彭城已被汉军灌婴攻占，项王不得不引军向东偏南沿着鸿沟与颍淮相连的河道东侧，撤向西楚边郡陈郡，想利用那里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饶的物力资源，进行休整补给。

张良与陈平揣摩汉王刘邦必“取天下”的欲望，献策趁“楚兵罢食尽”之时，“因其机而遂取之”。汉王采纳其计，撕毁和约，于五年十月（前 202）率本部兵马追击项王。前锋樊哙攻占陈城以北 80 余里的战略要地阳夏城（今河南太康县），汉王进驻阳夏西南 30 余里、陈城西北 42 里的固陵高地，与齐王韩信、梁相国彭越约期合击楚军。齐、梁大军至期不会。项羽对刘邦的背信弃义非常愤怒，向固陵汉军发起反击。汉王迎战大败，“复入壁，深堑而自守”。焦虑不安的刘邦向张良请计，张良提出汉王与韩信、彭越“共分天下”，各自为战的良策。刘邦发使告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韩信、彭越得到分地的承诺，皆报曰：“请今进兵。”

当时能够根本改变楚汉形势的是齐王韩信的大军。然而临淄至陈下将近千里，数十万大军携带辎重粮秣以日行一舍（30 里）计，一个月后方可全部抵达。在此期间，项王挟固陵初战大胜的声势，又在西楚王国内线作战，若再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在齐、梁大军到来之前，未必没有彻底解决汉王的可能。然而汉军两支外线作战的骁骑的不期而至，一支是齐王韩信于汉四年二月派出经略东楚的御史大夫灌婴统领的郎中骑兵，在攻占楚都彭城后，由东而西攻城略地，杀至距陈下不过百余里的苦县颍乡（今河南鹿邑县东），与刘邦会合；一支是刘邦由荥阳派出在西楚薛郡、泗水一带机动作战的骑都尉靳歙的骑兵，自北向南“还击项籍陈下”^③，使形势发生向汉方有利的转化。有了这两支极具冲击力的劲旅的参与，于是汉王

① 与传统认为垓下之战遗址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不同，苏诚鉴撰《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载《安徽师大学报》1979 年第 2 期）、《从“四面楚歌”再探垓下战场所在》（载《安徽史学》1998 年第 3 期），提出“垓下”即“陈下”（今河南省淮阳县）；陈可畏撰《楚汉相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载《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以为垓下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北部；辛德勇撰《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出版），亦持与苏、陈二氏相同的观点。

②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 版，第 331 页。以下引用此篇，不再出注。

③ 《史记·傅靳蒯成列传》，《史记》第八册，中华书局本，第 2710 页。

刘邦与谋臣张良等策划并实施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第二次固陵之战，亦称陈下之战。这就是《史记·樊酈滕灌列传》所说的樊哙“围项籍于陈，大破之”^①、灌婴“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著录的曲城侯盩逢“以都尉破项籍军陈下，功侯”^③、宣曲侯丁义“为郎骑将，破钟离昧军固陵，侯”^④、汾阳侯靳彊“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功侯”^⑤、广平侯薛欧“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功，侯”^⑥。此战汉军大胜，十多位将领立功封侯。楚军损失惨重，大将钟离昧所部全军覆没，钟离昧脱身逃亡，左令尹吕清、令尹灵常、陈县令利幾临阵倒戈而被汉王封侯。楚军实力折损殆半，从此失去对汉军大举反击的实力。因此，近年有学者力主陈下之战即楚汉最后决战，垓下为陈下地名，垓下之战是陈下之战的别称。

笔者以为，陈下之战并非楚汉的最后决战，而只是垓下决战的序幕。对此笔者另有《鸿沟媾和与垓下会战》专题讨论。

陈下之败使项王损兵折将，加以寿春沦陷，大司马周殷叛变投敌，陈城失去腹地，兵员补充、粮秣征收皆失来源。更严重的是，情报显示齐王韩信、梁相国彭越、淮南王英布与刘贾周殷数十万大军正从东北、北方、东南开赴陈下与汉王会师途中。项王不能困守陈城，相时度势，走为上策，于是选择适宜路线东撤垓下，以利休整将士、恢复元气，或相机再战，或退保江东。于是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

《史记》的本纪、世家都明确著录楚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项羽本纪》叙其事曰：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⑦

《高祖本纪》叙其事曰：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⑧

《荆燕世家》亦详记其事：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⑨

诚如唐人司马贞所言，“《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司马谈之生上距楚亡汉兴及项羽之死不过20余年，青年时代及见汉初开国功臣及其子弟，并与其中某些人士交游，熟悉楚汉之际的新鲜掌故。司马迁之生上距项羽之死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他“二十而南游江淮”时，曾亲访丰沛功臣的故里，踏勘彭城周边楚汉相争的战场遗址，他也有机会与汉初大功臣的孙辈如樊他广等交游，从他们那里获得可贵的口述史料^⑩。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任职太史，不仅掌管王朝图籍计书，而且因太史职任所在有权“绌石室金匱之书”，亲见宗庙及太常寺秘藏的皇室玉册及开国功臣的功录、剖符封侯的丹书铁券等文书秘档。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关于太史职责的自述，可知编纂大汉龙兴以来的现当代史，正是太史公的天职，在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前，《太史公书》原是太史公的职务作品，必须呈送皇上御览审定。作为楚灭汉兴的最后决战的战场所在及战役名称的著录，容不得丝毫讹错。基于以上种种因

① 《史记》第八册，第2656页。

② 《史记》第八册，第2670页。

③ 《史记》第三册，第911—912页。

④ 《史记》第三册，第921—922页。

⑤ 《史记》第三册，第961页。

⑥ 《史记》第三册，第885—886页。

⑦ 《史记》第一册，第332—333页。

⑧ 《史记》第二册，第378—379页。

⑨ 《史记》第六册，第1994页。

⑩ 对此，《史记·樊酈滕灌列传》有明确交代：“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史记》第八册，第2673页）。

素,《史记》所述楚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异议。

二、垓下系沛郡洨国境内的一所村落

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垓下又在哪里?其实汉魏文献早有答案。《史记·项羽本纪》:“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裴骃《史记集解》为“垓下”作注,先引东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在沛之洨县。洨,下交切。”又引东汉末人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曹魏博士张揖的《三苍注》为“垓下”作注曰:“垓,堤名,在沛郡。”^①《集解》与《索隐》一致指出“垓下”的地望在沛郡洨县,垓下是聚邑而非城市。李奇、张揖、徐广为“垓下”作注的依据都来自班固《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上》:“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属豫州。”沛郡共领37县,其中有“洨”。班固如此著录:“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育成。”^②《汉书》系班固奉诏之作,向以谨严著称。书中的《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之祖,极具权威性。班固作《地理志》,注重郡、县的置废析并沿革,用简明文字注明原委。郡下所属各县,一般只记录县名。若系汉前所置,或王莽更名,则于县名下出小字“本注”说明沿革。如《地理志下·淮阳国》领九县,首县为“陈”,班氏如此著录:“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陈陵。”若县内有具历史意义的乡聚山川,也于县名下出小字“本注”点出。如《地理志上·沛郡》领37县,其中有蕲县,班氏如此著录:“蕲垂乡,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蕲城。”

班固于县名下所作本注已形成规范的体例。所谓“蕲垂乡,高祖破黥布”,是说蕲县县域内有垂乡,高祖在那里打败黥布;而不是说蕲县县城就是垂乡。根据这个本注体例,可知“洨垓下,高祖破项羽”,是说洨侯国境内有垓下,是高祖打败项羽之所;而绝不能解为洨城就是垓下,垓下就是洨城。

若与范曄《后汉书》对照,就更为明晰。《后汉书》附晋人司马彪撰《郡国志二》,沛国领有21城,其中有“洨”,司马彪如此著录:“洨,有垓下聚”,其下有刘昭小字补注:“高祖破项羽也。”^③可见洨是“城”,而垓下是“聚”。再看《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颜师古注曰:“聚小于乡。”^④可知聚是较大村落的意思。故许慎《说文解字》说:“聚,邑落曰聚。”段玉裁《注》云:“按邑落,谓邑中村落。”^⑤段氏所说的“邑”义同于“县”。垓下是洨县县域内一个村落。

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经文“淮水又东,迳夏丘县南”之下的《注》文有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相似的记载:“洨水又东南流于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地。”^⑥

洨城为西汉洨侯侯邑。洨侯吕产是吕太后之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作“郊侯”,侯功栏记载:“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索隐》:“郊,一作‘洨’,县名,属沛郡。”^⑦吕产于吕太后元年(前187)始封郊侯,六年(前182)改封吕王,郊(洨)侯国除为洨县。洨县县邑遗址在今安徽固镇县濠城镇。

① 《史记》第一册,第333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二十五史》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宋景祐刊本,1998年,第397页。

③ 范曄:《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27页。

④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第325页。

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藏版,1981年,第387页。

⑥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⑦ 《史记》第三册,第980页。

三、《史记正义》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说”不可采信

楚汉相争最后决战的垓下战场,《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在沛郡洨县境内,汉魏六朝以迄初唐,八百年中从未异说。异说出现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杀青成书的《史记正义》。张守节于《项羽本纪》“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句下,为“垓下”作《正义》曰:

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①

《正义》此说得现代史家范文澜认可,其云:

刘邦得秦民拥护,又联合诸侯王,与项籍苦战四五年,屡败屡起。前二〇二年,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璧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鹿邑县境为是)决战,项籍败死。刘邦立为皇帝,统一中国,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汉朝。^②

故垓下为河南鹿邑县说也有相当影响。

张守节长于六书地理之学,为《史记》作《正义》时,凡遇古时地名,大都引据初唐李泰主编之地理总志《括地志》(全书早佚),以唐时地名予以对释。但所作“垓下”《正义》并未征引《括地志》,也未出具其他文献依据,显系张氏自出心裁。然而守节此项裁断是有问题的。

首先,此说与《汉书·地理志》“垓下”属沛郡洨国的权威记录背戾。而亳州真源县秦汉时为苦县,苦县秦楚之际属陈郡,东距沛郡的洨国四百余里,岂可牵合为一!又,《汉书·地理志下》有“淮阳国”,领有九县,陈为首县,其次有苦县。而于苦县,班氏本注仅简注:“莽曰赖陵。”不见苦县境内有“垓下”踪影。可见垓下与陈郡无涉。

其次,张守节关于“垓下”的注释不能自圆其说。就在《项纪》“至垓下”的上文“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句下,《正义》云:

父音甫。寿州寿春县也。城父,亳州县也。屠谓多刑杀也。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③

按:城父县春秋初原为陈国夷邑,后入楚,系战略要地,遗址在今安徽亳州东南70里处的城父集。张守节认定的“垓下”在真源县(今为河南鹿邑县)东十里,即秦汉时的苦县所在,其地方位在城父的“西北”,而不是“东北”。方向颠倒若此,显系向隅而造。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一与权威文献扞格,二非田野踏勘所得,自无采信的价值。

四、垓下聚当在濠城东北20余里处

近年有文物考古单位在安徽固镇县东濠城镇北二里许沱河南岸的“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进行考古发掘,有重大发现。此处20世纪80年代即号称“垓下遗址”。据发掘成果新闻通报得悉,考古专家取得共识,此处是目前发现的能够确切认可的史前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最早的城市。这里也是汉代洨城遗址。考古专家推断其前身即垓下,这是当年项羽退守至垓下,利用原有早期城址进行二次修筑,凭借优势的地理条件与刘邦抗衡所造成的结果。^④

笔者以为,在濠城镇“霸王城”通过考古发掘,发现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最早的城市遗址,对于研究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确定“霸王城”即西汉洨侯吕产侯邑旧址,与《史记·惠景间侯

① 《史记》第一册,第333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28页。

③ 《史记》第一册,第332—333页。

④ 据《安徽日报》2010年6月12日新闻稿《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及相关报道。

者年表》《汉书·地理志》、酈道元《水经注·淮水注》等权威文献若合符契,说明固镇县濠城镇“霸王城”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将“霸王城”推断为垓下遗址,则窃有所疑。第一,将未经确切证明的“霸王城”先行定名为“垓下遗址”,发掘后又未经充分论证就宣布其即为垓下遗址,岂非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其次,“霸王城”确是浚城遗址,但浚城是城,而垓下仅是浚国境内的一个聚落,二者属于不同层级,岂可牵合为一?这种推断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

垓下聚并非濠城镇北俗称的“霸王城”,而实另有其地。明、清方志及旧版历史地名辞典称垓下在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并非空穴来风。唐、宋两代权威的輿地志书不仅为垓下在沱河之北说出了有力的文献支撑,也为当今探寻垓下聚的真正所在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五·宿州·虹县》有如下记载:

西至州二百里。本汉旧县,属沛郡。虹,《汉书》作“𡗗”字。

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按:汉浚县属沛郡,浚音绞,汉垓下即浚县之聚落名也。^①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的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旧唐书》本传称他“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中,时多称之”。自京出任外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唐宪宗元和(806—820)间两度拜相^②。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甚高:“輿记图经……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③李吉甫撰著此书,充分利用了皇家秘藏图籍档案,又曾居官“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而沛郡各县正是他居官江淮所属之地,对于垓下聚的著录自可征信。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淮南道十七·宿州》有如下记载:

虹县,〔州〕东南一百五十六里。旧十乡,今三乡。汉县,属沛郡。

濠城,在县西南七十八里,即汉浚县也。属沛郡。垓下,浚县之聚落名。

垓下,在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王于垓下,大败之。有庙,在县西五十里。^④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年著名地理总志。乐史作为朝廷史臣,为维护国家统一,因合輿图所隶,考寻始末,条分件系,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然史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⑤

按:唐、宋两朝宿州所辖之虹县县治,即今安徽泗县县城所在地。以上两部地理总志对垓下聚的地望均以虹县县治作为坐标原点。《元和郡县志》说:“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太平寰宇记》说:“垓下,在县西五十里。”《太平寰宇记》还提供了一条具特殊价值的数字:“濠城,在〔虹〕县西南七十八里。”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知真正的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镇东北24里至28里,西北距灵璧县城40余里、东北距泗县县城40至45里的范围之内探寻,其地约在灵璧县毗邻泗县西界的单圩到后翟庄一带地势较高处。

楚汉垓下会战,汉方联军刘邦本部不少于20万,韩信自将齐军30万,彭越梁军至少五万,刘贾、英布、周殷九江军当近十万,总数在70万左右,号称百万,而以韩信为前敌总指挥。所以日后汉皇刘邦论及韩信之功时才会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⑥。项王兵力只“可十万”。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将近百万之众,战场应在垓下聚周遭方圆百里的更为广阔的地带。垓下聚不过是项王会战大败之后,收缩残部据此村落高地退守之所。此时项王手下的楚军仅余数万,与汉军兵力几近十与一之比。孙子曰:“用兵之法,十则围之。”^⑦所以《项羽本纪》才会有这样的文字:“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

①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第467册,第244—245页。

②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浙江古籍出版社缩印宋刊本,《二十五史》第四册,第272页。

③ 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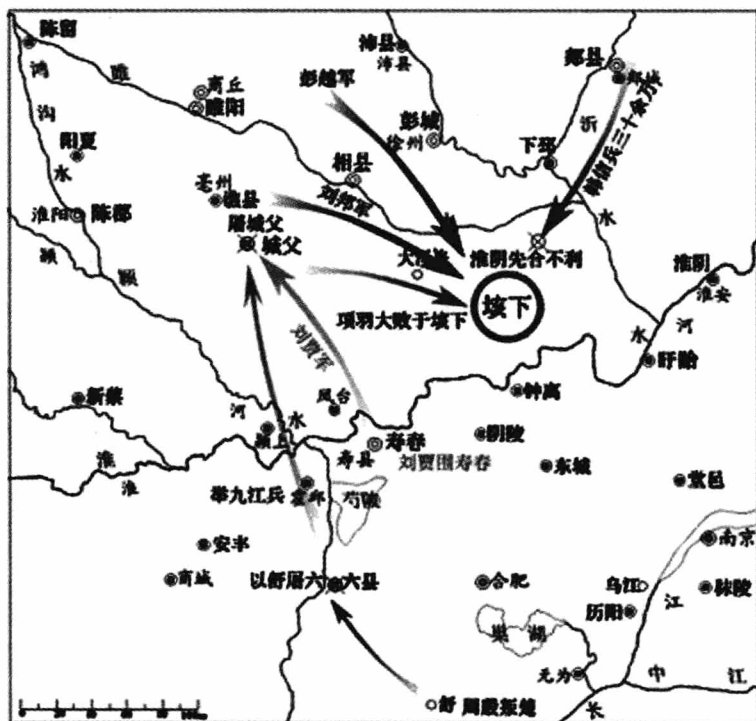
④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第468册,第74—75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第595—596页。

⑥ 《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第二册,第381页。

⑦ 《孙子·谋攻第三》,《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南京三江学院许盘清教授制图)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建邦编)

研究综述

2010 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2010 年的司马迁研究呈现出某些值得期待的景象,论题越来越广泛,此前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都受到关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以下我们将从九个方面对 2010 年的司马迁研究做以简单的评述。

司马迁生平叙述及其学术史反思

司马迁生平考证没有任何新的进展,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2010 年,与司马迁生平考证相关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对近代学者如何把司马迁生平考证确立为独立学术命题的过程及其隐含的意义进行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反省,其二是非专业领域尝试建立司马迁生平的新的叙事模式的努力。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虽然不会在细节上推动司马迁生平考证,但能够促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司马迁的生存遭遇及其人生抉择对于当代的重要意义。

党艺峰的《关于“司马迁生平考证”的学术—思想史考察——〈史记〉阅读札记之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6)从学术—思想史角度反思“司马迁生平考证”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意义,同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某种新的思考。论文指出,《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已经从整体上给出了司马迁生平的基本状况,同时由于《史记》被纳入官修正史序列,作者必然遭遇匿名化的遭遇,因此,在古代学术史的范围中,司马迁生平考证并没有构成独立的命题。近代以来,张惟骧、朱希祖和王国维等的先后考订制作司马迁年谱,但是,张惟骧的《太史公疑年录》和朱希祖的《司马迁年表》的学术影响非常小,只有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和很多年以后郭沫若回应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对于作为独立命题的司马迁生平考证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王国维和郭沫若都是天才型的学者,他们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把司马迁生平考证确立为独立的学术命题,在他们的全部研究中只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如果超出单纯的学术史眼光,这一命题的确立过程却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史内涵。近代以后,历史学开始职业化,每一个历史学家多少都需要为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学科的意义辩护。因此,司马迁生平考证作为独立学术命题的确立过程可能具有的思想史内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王国维意识到了历史学家在当代的特殊地位,他知道,一个拥有专名的历史学家在当代只能卑微但必须有尊严地活着,而郭沫若游走于政治、学问两域,他知道自己必须戴着面具,在内心深处,他知道戴着面具就象征着卑微,但他所拥有的青春气质促使他不甘于卑微。因此,他们塑造出了完全不同的两幅司马迁的肖像,也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当代历史学家的理想肖像。其次,王国维和郭沫若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性气质,他们都走进自己时代的深处,但历史学家的心性气质一旦逼肖自己的时代,就不再拥有完全个人化的内容,而成为政治神学命题。王国维和郭沫若的学问领域甚至方法都高度接近,其中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史料。这当然也是所有历史学家都面临的问题。史料在流传时所遇到的问题与过去的生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对技术专家有重要意义,而且涉及上一代如何将记忆传给下一代的关键问题。当历史学家处理史料时,只要涉及如何传递文化记忆的问题,他就必须作出政治神学选择。王国维有一种对未来的深沉忧虑,这种忧虑类似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梅列日柯夫斯基所描述的状况:“未来的无赖”。因此,他一生的学问实践所孜孜以求的是借助历史学让我们的民族能够不断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是一种向后回眸的姿态,在这种姿态里,有文化托命的责任感。郭沫若天生是革命者,而且终生保

持着不断革命的姿态，他始终是一个政治的浪漫派，他随时期望着历史本身的奇迹。这是完全不同于王国维的政治神学选择。最后，在司马迁生平考证的具体命题展开过程中，王国维和郭沫若虽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考据学风格，但是，其底蕴所在大概可以借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说：“考据学已不再是一门无足轻重的辅助学科，它有着广阔的前途，借助于考据水平的精益求精，历史学将自豪地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崭新大道。”在王国维和郭沫若之后，他们在司马迁生平考证命题中所隐含的学术—思想内涵已经被彻底遗忘，因此，无论作出多少人为的努力，司马迁和《史记》研究都渐渐从当代学术主流淡出。这种状况自然与研究对象无关，也无损于司马迁和《史记》的伟大，然而的确需要热爱司马迁和《史记》的人深长思之。

唐庄尧在第五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的获奖作文《文臣武将之司马迁篇》（小作家选刊）显示出“90后”一代对司马迁生存遭遇的理解。文章用夸张的方式描述汉武帝刘彻的“君临天下”，说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需任何理由罢黜宰相在内任何官员。但司马迁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书生与汉武帝之间的较量写出了精彩的历史华章。文章从汉民族和匈奴人的文化性格比较出发，暗示出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盲目的，这构成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大背景。为李陵辩护，让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对立突然明朗化。因此，司马迁必须在生死间作出选择，他一咬牙选择了受宫刑代替死亡。当然，这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选择。但司马迁不要一时的轰轰烈烈，也不追求那些死亡的刹那壮烈，“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利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从狱中出来后，司马迁仍在政府工作，拜为中书令，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他很是压抑和苦闷，但却只能沉默，在沉默之中，他坚守自己的脊梁，并磨砺着批判的锋芒。

李木生的《人之歌——重读司马迁〈史记〉》（随笔/2010/02）用散文化的形式记录自己对司马迁生命的解读。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司马迁到底有多苦？文章从清代所遗留的遭受阉割者的图片资料和鲁西南农村“捶牛”（一种原始的阉割公牛的方式）场景的描述出发，几乎是用直观的方式让骤然而至的宫刑所引发的痛苦展现出来，强调它十倍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不仅是短暂的残害，更是终生的凌辱，既是肉体的惨剧，更是心灵的煎熬。经历这种苦难，司马迁完成了一种彻底的转变——超越愚忠的窠臼和所谓“国家”、“今上”等一切物化的畛域，洞察人的真相，从求媚于主上的奴仆提升自己成为独立评说历史的真正的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站在清醒的人道和人性的立场上立德、立言的知识分子。第二，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文章指出，在长期专制政治传统中，形成以言治罪的恶劣局面，但必须有人站出来，将不许说的真相说出来。而司马迁就是这个站出来说话的人，这正是司马迁可贵的地方。第三，司马迁与孔子。文章指出，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孔子，留下了最感人的孔子形象——一个独立于列国统治者并敢于对他们说“不”的布衣，一个“长九尺有六寸”的伟岸的布衣，一个充满热气腾腾的正气和充沛着阳光的人。因此，孔子成为司马迁心中唯一的至圣。

司马迁天道观念研究

司马迁的天道观是司马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一直没有重要的突破。在2010年，这个命题出现的论文相对集中，而且质量也比较高。章启群借助自己深厚的学养从学术、思想史的大背景中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作出一种还原本义的理解，安小兰则引入政治哲学观念从福德关系角度对司马迁天道观念的理解作出推进。

章启群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目的是在秦汉学术、思想背景中澄清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原本意义，论文指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司马迁所谓“究

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还原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可以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司马迁父子与占星学的关系。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这样阐述阴阳家的思想和职能：“尝窃观阴阳之，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所谓“大祥而众忌讳”即是占星祈禳之举。而之所以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正表明了司马谈及其职守与占星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因此，司马迁也必然与占星学依旧保持密切关系。司马氏父子与占星学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学术史、家族传统和师承等方面得到证明。上古的天文学属于王室专门之学，为史官所执掌。虽然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史官未废，而且百家学术依旧蛰伏于民间。西汉建立之后，废挟书律，设“五经”博士，终于造成“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局面。在这种学术史背景下，正如司马迁所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占星、占气、占岁都是阴阳术数、五行杂占一类，由此可见唐都是汉初首屈一指的占星大家，而司马谈就“学天官于唐都”。“司马氏世主天官”，到了汉武帝时代，又父子相继任汉太史令，掌握、研究占星学必然成为他们的基本职守。其次是《史记·天官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司马迁作《天官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对流行的各家占星学说进行甄别和综合，因此，《天官书》是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描述星官的著作，也可谓当时的集占星学大成之作。《天官书》首先把整个天空分为五个区域：中宫天极星，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每一宫由数个星组成，星即是官职，与人间等级制度对应。同时还记载了星象、方位、季节和五行的关系以及日食、月食和五星占等内容。从整体上看，《天官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方面是描绘各个星区组成与分野，每个星宿的位置功能，一些星宿运行规律及其逆、孛，日食、月食、彗星、雷电、霓虹、霹雳、夜明等与星占相关的事象，另一方面是人间事务，如兵灾水旱、地动山崩、六畜兴旺、鱼鳖鸟鼠、五谷草木、排兵布阵、内乱外侵等等。而司马迁的立足点在于天体星相“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这种占星学观念。最后是“天人之际”的意义考释。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天人之际”的地方有三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史记》撰述动机时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又有“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天官书》也说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三处的意义应该是统一的，因此，“究天人之际”中的“天”就只能是占星学意义上的天，司马迁探求的“天道”就只能是占星学的思想理论。从汉代学术思想状况看，在占星学已经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相信宇宙中日月星辰的运行，与人类社会生活的运转是对应的、交汇相关的、有规律可循的，不仅是占星家和术士们的观点，也基本上是当时的儒生和帝王的共识。因此，司马迁是把占星学当做一种严格的科学理论来对待的，他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这与司马迁所追求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旨趣也是一致的。

安小兰的《司马迁对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史记·伯夷列传〉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围绕德福关系即个人道德和福报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作出新的阐释。论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1. 从《伯夷列传》是用以提示列传写作义例的纲领性文本这一经过前人论证的结论出发，指出贯穿《伯夷列传》的文本内部的基本主题实际上就是德福关系问题。2. 自殷周以来，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就有一种“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这个说法的基本内涵是：“天”是主宰人间祸福的最高存在，代表了最高的正义力量，其行事的原则是，福佑有德之人，降祸无德之人。此即俗语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类相信并渴望个人德行能够获得美好的报施，然而，这一美好的愿望在世俗社会中却屡屡得不到验证。德福背离的社会现实使司马迁对传统的天佑善人观念发生了怀疑，并激发他对德福关系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在疑惑天道的形式之下，司马迁希望寻找的，是个人德行与报施之间关系的